

■文学艺术研究

戴望舒在萧红研究中缺失缘由探析

韩秋红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渭南 714100)

摘要:戴望舒和萧红都是著名作家。戴望舒与萧红的交集,不仅仅是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来往,也有朋友之间的私交,以及在人格魅力上的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但在萧红研究里,戴望舒似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关于戴望舒的资料看来是故意舍弃了。本文意从戴望舒在香港向萧红与端木约稿、戴望舒与萧红在香港的交友、戴望舒在萧红研究中缺失缘由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关键词:戴望舒;萧红;友谊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7)03-0081-04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7.03.018

A Study on the Reasons of the Lack of Study about Dai Wangshu in Xiao Hong's Research

HAN Qiu-hong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100, China)

Abstract: Dai Wangshu and Xiao Hong are famous write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ai Wangshu and Xiao Hong is not just editor and authors' contact, but also good friendship. Both of them has the personality charm on mutual appreciati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trust. But in the Xiao Hong's research works, Dai Wangshu seems to be an unessential character a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Dai Wangshu seems to be deliberately abandoned.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ree aspects of the reasons.

Key words: Dai Wangshu; Xiao Hong; Friendship

戴望舒,中国现代派诗人,翻译家,文学编辑。1927年发表《雨巷》便一举成名,因而享有“雨巷诗人”的美誉,他的“诗歌创作堪称中国新诗第二次整合的界碑”^[1]。其主要成就在于将西方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巧妙的结合,开创现代新诗文体,为中国新诗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作品有诗集《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等。

萧红,著名女作家,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因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的不满,19岁便离家出走,历尽坎坷。1935年因发表《生死场》而蜚声文

坛,主要作品有《旷野的呼喊》、《马伯乐》、《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和《北中国》等。“萧红是一位生在上世纪初,但怀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观念的前卫女作家,她的成就不单纯在于她的艺术才华和写作技巧,还源于她短促生命的凄美个性。”^[2]

一、戴望舒在香港向萧红与端木约稿

1938年5月,戴望舒与家人及朋友,乘坐一条爪哇轮船公司的八千吨邮轮“芝沙丹尼”号离开战乱的上海,来到香港。居住在香港大学外籍教师、法国人马尔蒂老太太的花园洋房 Woodbrook Villa,戴

收稿日期:2016-11-05

作者简介:韩秋红,女,陕西渭南人,渭南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当代语言现象。

望舒译为“林泉居”。8月1日,香港《星岛日报》正式出版发行,戴望舒任副刊《星座》主编,这在当时属于“全国性的,权威的文学副刊”^{[3]192},很多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艾青、茅盾、萧红、徐迟、萧乾等人都是《星座》的专栏作家或撰稿人。戴望舒利用手中阵地,编发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表现非常积极。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广州、成都、昆明、桂林等先后成立分会。1938年底,楼适夷南下到了香港,筹备成立香港分会,总会从重庆致函戴望舒,邀请他参加筹备工作。1939年3月26日,香港分会成立。协会主席是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戴望舒与叶君健担任研究部西洋文学组负责人。事实上文协领导工作“主要差不多落到了戴望舒的肩头”^{[3]193},戴望舒抛头露面负责文协的各项工作。

1937年,萧红和端木蕻良在重庆北碚的黄桷树复旦大学教书,戴望舒跟他们写信约稿,希望端木能写个长篇,以便在《星座》连载,端木为了生计,正打算写“一篇民族抗战的小说《大江》”。戴望舒为了使版面活跃,又来信要端木亲笔题写篇名。萧红看了信,顺手在桌子上提起毛笔,在毛边上写下“大江”两个字。”^{[4]363}有一次,端木生病,不能动笔,为了不使连载中断,萧红曾替他写了一大段。在此期间,萧红把自己已经完成的小说《旷野的呼喊》寄给了戴望舒,从1939年4月17日起到5月17日止,整整一个月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上连载。之后,萧红陆续在《星座》上发表了一些作品,1939年8月15日发表《花狗》,1939年10月2日发表《茶食店》。1939年10月18日起到10月28日,发表《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二、戴望舒与萧红在香港的交谊

1940年,重庆北碚经常遭到日军空袭。在飞机的轰炸中和无休止地躲避空袭的奔波中,萧红的身体非常虚弱,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月19日,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往香港。他们来港的原因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和端木都有些文章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生活不会成问题。”^{[4]364}再加上大时代书局邀请端木蕻良编辑《大时代文艺丛书》。香港的报刊上指的就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在战乱的年

代,香港既是一处可以躲避战火的港湾,同时还能吃饱饭。戴望舒在香港热情地接待他们,以前虽未谋面,只是书信来往,但神交已久,此时一见如故,请他们吃饭,请他们去林泉居居住,非常热情,并给他们介绍新朋友,熟悉文艺界,邀请参加各种活动,并继续约稿。

1940年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举行欢迎会。萧红在会上报告了“重庆文化粮食恐慌情况,希望留港文化人能加紧供应工作”。1940年4月23日,萧红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会员身份,登记成为“文协香港分会”的会员。

1940年8月3日下午,香港文协、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木刻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和香港业余联谊会等文化团体联合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召开了前所未有,规模很大的纪念会,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萧红在会上负责报告鲁迅先生生平事迹。8月3日晚上,在孔圣堂举行内容相当丰富的纪念晚会。会上演出了萧红到港后写的哑剧《民族魂》。1940年8月3日到9日,《星座》发表《略论民族魂鲁迅》(署端木名,其实是倾注萧红和端木两人共同的怀念和见解的)。

1940年8月18日,《星座》副刊学生园地第六七九期刊出启示“萧红女士新著长篇小

说《馬伯樂》,不日起將在本刊連載,請讀者注意。”不过,查阅许多资料,却找不到在《星座》上刊载的具体时间。经考证,1941年1月《马伯乐》香港大时代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称为“上部”。香港《时代批评》半月刊1941年2月1日该刊第64期起,直到1941年11月1日第82期,共15期,发表过《马伯乐》9章内容,称为“下部”,但结尾标明:“第九章完,全文未完。”萧红因病重辍笔,未能续写。1981年1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纪念萧红诞辰七十周年时出版了《马伯乐》的第一次全文版本,分为“第一部”和“第二部”。

1940年8月31日《星座》副刊学生园地第六九二期刊出启示“蕭紅女士新著長篇小說《呼蘭河傳》,將自明日起在本欄連載,祈讀者注意及之。”1940年9月1日到12月7日,《星座》用三个月的时间刊出

萧红的巅峰之作《呼兰河传》。这部著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经过戴望舒的运筹推向社会的。在这四个月中,为审稿、发排等工作,戴望舒费尽了心血。就连远在新疆的茅盾,也十分了解此事,1940年,他在给诗人蒋锡金的信中说:“红姑娘创作甚努力,闻有长篇在《星岛日报》副刊排日登载。”萧红对戴望舒这位文学前辈及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感激。

1941年4月13日到29日,《星座》连载萧红于3月26日完成的一部1.6万字的小说《北中国》中的十四段内容。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因生前喜欢到浅水湾散步,骨灰葬于丽都酒店花园边的浅水湾。

1942年11月,戴望舒与友人在日本记者陪同下进入浅水湾,费尽周折找到了萧红墓,墓依旧完好,“他们放下了带去的花圈,又照了两张相”。^{[5]186}这是他们“第一次拜谒了萧红墓”。^{[5]187}1944年8月,戴望舒偕友人再次来到浅水湾凭吊萧红。9月10日,戴望舒在《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第33期上发表了题为《墓边口占》的短诗: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偷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1944年11月,端木身在贵阳,给在香港的戴望舒去信,表示自己现在去不了香港,拜托戴望舒能“分神照料”萧红墓。他收到信后,于12月20日步行6个小时,来到萧红墓献上一束红色山茶花,代端木蕻良祭扫,并照了相和口占一首诗。照片和诗通过大公报社转交到端木手里。之后,戴望舒多次凭吊,或献上一束红山茶,或在墓畔留影,并写下了一首“伟大的诗”。^[6]在纪念萧红的文章里,最好的诗歌便是戴望舒的这首《萧红墓畔口占》,情感真挚,艺术手法高超,读之感人至深。戴望舒与萧红之间的友情,此诗可鉴!

三、戴望舒在萧红研究中缺失缘由

戴望舒与萧红在香港的交游,不仅仅是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来往,也有朋友之间的私交,以及在人格

魅力上的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但在萧红研究里,戴望舒似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关于戴望舒的资料看来是故意舍弃了”^[7]。究其缘由,笔者认为可能与端木蕻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戴望舒与萧红的交往,缘于端木蕻良,而拜谒萧红墓,也是受端木之托。刘宝昌在《戴望舒传》里说,戴望舒与端木二人有许多共同点,文学上喜欢晚唐的李商隐。性格有几分相似,都热心抗战事业,都搞文学创作和文学编辑职业,彼此非常欣赏。

而端木蕻良在《友情的丝——和戴望舒最初的会晤》里说,他俩都喜欢元稹的诗,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着共同的见解。起初在上海没有见过面,也未通过信,他们在香港接触是很频繁的。戴望舒接受了他的建议,写《诗坛随想录》,并将翻译的外国《诗论》交给他,让他编《大时代文艺丛书》。戴望舒帮端木在《星座》上发表《论阿Q》、《再论阿Q》、《蒿坝》、《单表〈六师爷——从小市民说到新水浒〉》和《北风》,不余遗力,不厌其烦。他们谈论一些问题,彼此也能理解,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代文化人的命运,两人内心是相通的。

1942年的春天,戴望舒被日本人关进监狱,原因是与离开香港的抗日作家端木蕻良过从甚密。端木蕻良在香港时候,抗日表现比戴望舒积极,又是知名的左翼文学人士,深受日方的痛恨,而戴望舒虽然一向热衷于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但与左翼的关系是若即若离,日方没有必欲除之而后快。香港沦陷,端木蕻良接到情报,远走内地,日方恼羞成怒,逮捕了没有撤离的戴望舒,让他揭发端木蕻良,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但他始终不曾出卖端木蕻良。1942年4月27日,戴望舒在狱中写下了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的《狱中题壁》。这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高峰,堪称是现代新诗的爱国诗作经典。

端木蕻良对于戴望舒因他而入狱,深感内疚,修书一封,表达歉意。信中写道:“望舒兄:马季明先生来桂时告我兄被诬陷入狱备受苦刑,马先生当时并以经过相告。谓日宪以一黑名单送兄指认,当时兄虽以弟为念者因而被捕,果如是则兄之苦刑实由弟所起,心兹不安,并一时达衷悻而不能,其痛苦想与兄所同也。今者,忠奸大白,兄之亮节,久之弥望,而弟之同情可借斯纸而传达也,但以不愁确址,幸星岛

日报能代为传达,幸何如之。”

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举办婚礼,这是不被祝福的婚姻。因为萧红的朋友对端木蕻良的印象十分不佳,在感情上有意排斥。端木蕻良的家人对他娶有着复杂情感经历的孕妇非常惊讶而且惋惜。在纪念萧红的文章里对端木蕻良有多种称呼,多是一些不敬之词,都持蔑视、抨击的态度。萧军在回忆录里认为萧红跟着她爱的人终于毁灭在了战乱中的香港。王鹤在《萧红:文字与人生一起脱轨》一文中说,在香港,胡风看到萧红病弱不堪,对端木蕻良又添恶感,甚至认为端木蕻良毁坏了萧红“精神气质的健全”,使他“暗淡和发霉了”。胡风的夫人梅志则认为萧红去香港的原因就是牺牲自己的独立精神而屈就端木蕻良。

但是真正让端木蕻良背上恶名的是萧红在香港寂寞的死。萧红的朋友认为,对于萧红的死,端木蕻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萧红结识端木蕻良后,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萧红尽管性格倔强勇敢,但毕竟是女人,需要丈夫的呵护与温存,况且在多难和病重时期。端木蕻良是个文艺青年,从小就受到别人的照顾与溺爱,依赖性很强,又是生活能力很差的人,不会也不懂得要关爱呵护妻子,反而要萧红来为他操心受累。从武汉撤退时,萧红让端木蕻良先走,他就先走了。在香港,萧红同意他突围,他就准备突围撤离了,他这种只顾自己的举动使萧红感到被冷落被遗弃了。漂泊中的人总是担心被遗弃,孤独伶仃。萧红这样的处境更加引起朋友对端木蕻良的不满。比如邀请他们到香港的周鲸文认为“萧红在感情上所受的苦楚太重了,直到三十多年后提到这件事时,对当时在萧红身边的端木蕻良,似有微词。”^[8]骆宾基在谈到萧红生前的寂寞、抑郁和她的死因时,也是过分地谴责端木蕻良。“二萧哈尔滨时期熟人后旅居台湾的孙陵,在其《浮世小品》里专文述及端木与萧红之关系,题目赫然为:‘端木永做负心人’”。^[9]萧红去世后,好友白朗便撰文道:“据传说,红竟爱上了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10]等。

这位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11]的女作家在香港凄惨寂

寞死去,毕竟只有31岁,如花的年龄,不能不让爱她的朋友垂怜惋惜,于是人们更是将对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作家的巨大同情,变成对端木蕻良的不满而迁怒他。他在所有的纪念萧红文章里都是一个非常猥琐的角色,自私,怯懦,麻木不仁。对于他们存续了四年的婚姻生活,也大多视若无睹、置若罔闻,对他的为人更是众口一词地嗤之以鼻。偶尔有一两篇正面记述两人夫妻情深的文字,不是因为作者人微言轻,就是寡不敌众,或因是端木蕻良近亲,而被淹没在对其口诛笔伐的众声喧哗之中。而端木蕻良与戴望舒来往密切,多次著文谈及与戴望舒的友情。古人云,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胥余。因为端木蕻良,研究者将戴望舒的资料故意舍弃了。中国自古就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戴望舒没有被口诛笔伐已是万幸。这大概可能也许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吧!

[参考文献]

- [1] 龙泉明. 中国新诗的现代性[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16.
- [2] 冯慧莲. 30年代文学洛神[N]. 羊城晚报,2013-3-20.
- [3] 徐迟. 我的文学生涯[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 [4] 季红真. 萧红传[N].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 [5] 王文彬. 中西诗学交汇中的戴望舒[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6] 臧棣. 一首伟大的诗可以由多短[J]. 读书,2001(12).
- [7] 北塔. 不仅仅是一首悼诗:萧红与戴望舒的交谊[G]. 上海鲁迅研究 2011 夏.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 [8] 据一九七八年十月二日周鲸文口述资料.
- [9] 引自叶君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51c76301018e20.html.
- [10] 白朗. 遥祭——纪念知友萧红[J]. 文艺月报,1942(15).
- [11] 胡风.《生死场》读后记[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 李兆平]